

崔洪彬 主编

# 朝鲜族研究论丛

延边大学出版社

4

## 《朝鲜族研究论丛》(4)

### 目 录

1. 论本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东北朝鲜族资产阶级  
民族主义者的反日民族运动……………朴昌昱(1)
2. 浅谈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  
对朝鲜独立运动的援助……………崔洪彬(49)
3. 朝鲜义勇队史论……………崔凤春(63)
4.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对朝鲜族自治政策的历史考……………金哲星(92)
5. 试论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地区朝鲜民族共产主义  
者的基本方针及其影响……………玄千秋(117)
6. 论“九·一八”事变前在朝鲜族问题上的  
中日矛盾及其影响……………方 香(152)
7. 试论大倥教的性质……………禹英兰(179)
8. 朝鲜族人民反日斗争和临江日本设领事件……………孙春日(194)
9.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三省朝鲜人的  
入籍情况……………千寿山 洪景莲(207)
10. 东北朝鲜族人民民主同盟的  
建立及其历史作用……………金昌国(223)
11. 浅谈解放战争时期李红光支队的历史贡献……………张永福(243)
12. 延边汉族与朝鲜族关系形成的  
特点及其发展变化的趋势……………宋官德(266)

13. 朝鲜族文化素质浅析……………任熙俊(278)
14. 我国解放后创办的朝文杂志……………崔相哲(290)
15. 论延边民族法制建设的若干问题……………许元宪 金河录(318)
16. 朝鲜族婚姻制度浅析……………全信子(326)
17. 浅析朝鲜族妇女外柔内刚性格的社会基础……………车明淑(332)
18. 金少芝和他的诗集《逸园诗稿》……………赵则训 韩昌熙(338)
- 后记……………崔洪彬(347)

# 论本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东北朝鲜族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反日民族运动

朴 昌 昱

## 序 言

所谓历史，乃是人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的客观事实。正因为如此，既成的历史，是不能按照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篡改的。同时，每个时期的历史运动或历史事实，从纵向看，是过去的继续，孕育着未来的发展或衰退的因素；从横向看，则受到当时错综复杂的各种条件的制约，各种历史事件互相牵制、联贯和依存，从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也就是说，历史运动不是单线运动而是复线运动，不是直线运动而是曲线的螺旋运动。所以，在历史研究方面，必须铭记的是，每个历史运动或历史事件不是孤立的。从纵向看，它们是整个历史潮流的一个环节；从横向看，只有在当时所造成的主观条件和所发生的变化中，以及与其他事件的联系中，加以实事求是的考察，才能比较正确地弄清楚每个历史运动和事件的真面目，否则，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会违背事实，甚至肆意加以歪曲或夸大。

过去，有的学者在研究本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在清朝鲜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所领导的反日民族运动时，由于缺乏上述全面的观点，竟把20年代的“三府鼎立”时期的反日民族运动视为其“全盛时期”。评述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的抗日武装斗争时，往往只强调北满的“韩国独立军”的活动，而忽略南满的“朝鲜革

命军”的斗争，甚至于暧昧莫如深。结果“九·一八”事变以后在满朝鲜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反日武装斗争的中心便被随意颠倒，他们的反日民族运动也被认为终结于“韩国独立军”被解散的1933年。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只要考察东北朝鲜族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史，我们便可知本世纪头10年是朝鲜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所领导的反日民族运动的兴起期。到了1919年，这一运动形成了高潮，运动的形式也转为武装斗争。1920年青山里战役的胜利则是其顶点。20年代朝鲜族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特点是：处于新旧思想运动的交替期，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反日运动虽然从1922年起又有起色，并且于1925年实现三府统一，运动的形式也由武装斗争转为以建立巩固的反日基地为主的“自治运动”。但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这一时期开展的运动，不是处于什么“全盛时期”，而是由于本身的致命缺点和新思潮的影响下逐渐分化和衰退，进入了低潮时期，而共产主义者所领导的反日民族运动则作为时代的新潮流蓬勃兴起，到1930年便已在整个反日民族运动中占据了优势。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所领导的反日运动，虽然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一度曾有新的起色，搞了一些抗日武装斗争，却因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坚持到底，终以失败而告终。与此相反，共产主义者所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虽然到了40年代进入了低潮，但是它却成为整个抗日斗争的主流。

当然，我们说，朝鲜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所领导的抗日斗争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未能持续下去，并非说它在1933年就已寿终正寝。

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弄清楚20年代朝鲜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所领导的反日民族运动的兴起，分化与衰退的原因，探讨其历史教训，其次，考察一下“九·一八”事变后在南北满进行的“韩

国独立军”和“朝鲜革命军”的抗日武装斗争，意在纠正所谓东北朝鲜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所领导的反日斗争结束于1933年的谬论，进而对两军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

### (一)

1921年5月以后，侵入延边的日本侵略军撤走，日本侵略军的大规模“讨伐”告一段落。潜入各地的朝鲜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日团体(以下简称民族主义反日团体)重新活跃起来，他们揩干身上的血迹，继续进行反日斗争。

当时，各地的民族主义反日团体通过斗争接受过去因各行其是、各自为政使反日力量削弱的教训，尽快团结分散于各地和已被解散的残存反日志士加强反日力量。于是，在南北满各地的反日团体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20年代初，南满地区的反日团体最先开展了这一团结运动。1921年10月，军备团、兴业团、太极团和大震团等反日团体在长白县联合成立了“大韩国民团”，只是不久即又各奔东西。紧接着，1922年2月，西路军政署，大韩独立团，壁昌义勇队，光复军第一营，平北督办府，普合团和光韩团等反日团体的代表聚首在宽甸县的三道沟，召开南满韩族统一会议，成立了统军府，推选蔡相德为总长，金东三为副总长，金昌焕为军队司令。到这年6月底，统军府先后召开了两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和地方总管所干部会议，讨论了如下两大问题：第一，统军府必须吸收南满所有的反日团体作为自己的成员，使它们接受统一领导，第二，统军府不是单纯的军事组织，而应是兼管政治和军事的组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南满朝鲜族人民进行全面的领导。因为，参加统军府的不仅有军事团体，还有政治组织和群众团体。当时，基于反日民族运动的长期性，要想建立稳固的反日基地，

必须改善南满朝鲜族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状况以及生活条件，于是，这年8月，西路军政署，独立团和宽甸东路韩侨民团等反日团体的代表在桓仁县马圈子聚会，成立了大韩统议府，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由文治派的金东三担任总长，蔡相德担任副总长，下设民事、交涉、军事、财政、学务、法务、交通、实业等部门，并在南满各县设立26个总管所，成立了标榜南满朝鲜族人民进行自治的行政机构。但是，统议府内部有保守的纪元派和激进的民主派之分，前者主张“光复李朝封建统治政权”，后者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制。这两派的矛盾日益激化，终于发生了武装冲突。1923年2月，纪元派的全德元退出统议府，在宽甸一带成立了义军府。1923年8月，发生第二次分裂。统议府武装队的第一中队中队长蔡灿（白狂云）、第二中队中队长崔锡厚，第三中队中队长崔志丰和第五中队队长金鸣凤等，对统议府在“解放祖国的伟业”中否定上海临时政府而独断专行，并与坚持进行武装斗争的全德元派搞自相残杀等做法深表不满，随即退出统议府，同上海临时政府取得联系，成立了驻满陆军参议府，在桓仁、长白、辑安等地建立了抗日基地，声称广泛进行反日武装斗争。

①1924年7月，统议府迁至桦甸吉林地区。为了团结整个东北的民族主义反日团体，统议府由梁起铎等出面说服这些团体，召开了全满统一筹备会议。这年10月18日，统议府、军政署、光正团、义成团、吉林住民会、卡伦自治会、独立军团、劳动亲睦会、固本契和同学会等团体的代表欢聚一堂，成立了正义府，在辽宁和吉林等广大地区设立了12个总管所。②

这样一来，南满一带的民族主义者的反日团体，大体上已经隶属于参议府或正义府。

在北满地区，自从发生庚申年惨案之后，原来活动于延边的那些反日武装团体一度曾集结于密山，然后转移到西伯利亚。不

久，一部分人留在当地，另一部分人从苏联回到北满。诸如原属军政署、血诚团、新民团、大震团、光复团和义军府等反日团体的幸存成员，于1922年8月组建了大韩独立军团，公推李范允为总裁，金佐镇任司令官。与此同时，玄天默和曹成焕等以密山县白泡子为中心，成立了军政署，并开展了反日活动。不久，大韩独立军团在穆稜县马桥河被中国官府解除了武装，军团的干部们只好暂避于宁安、海林一带，一方面夺取宁安人籍户会的地盘，另一方面逐渐扩大势力。<sup>③</sup>1925年1月，正义府在南满成立后，留在北满的反日团体也以大韩独立军团和军政署的代表为中心，召开扶余族统一会议，决定实现北满一带反日团体的大联合。同年3月10日，大韩独立军团、军政署和中东铁路沿线各地的民众代表聚集在宁安县，成立了新民府<sup>④</sup>，推选金赫为中央执行委员长，李范允为参议院议长，玄天默为检察院委员长，金佐镇为军事委员长。活动于北满和延边地区周围的反日团体，大体上也隶属于新民府。

“庚申年事变”之后，东满的反日团体大部分已经北上，许多反日基地被破坏，一部分幸存者的成员隐藏于各地，或继续活动于敦化、汪清和琿春。转移到敦化的“间岛国民会”，曾成立了军事部，并与活动于安图县的大韩独立军备团的特务队联合起来，成立了大韩义勇军事部，只是不久就宣告解散。曾经活动于延吉县三道弯的原义军府和北路军政署等团体的残余人员，组成了高丽革命军后，不久也归属于新民府。曾经在琿春边境活动过的琿春韩民会，把基地设在俄领沿海州，常派人到琿春县境内活动。后来，其成员大都加入了共产党。

总之，以1925年为分水岭，在东北的民族主义者所领导的反日团体都已分别隶属于南满的正义府，参议府或北满的新民府，形成了三府鼎立的新局面。

“庚申年惨案”之后，在东北的民族主义者开展的反日民族运

动，其发展变化有以下几点：

第一，其中心由东满转移到了南满。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大规模“讨伐”，使东满大部分反日武装团体转移到了北满和俄领，东满的反日基地则遭到严重破坏。而南满地区所受的破坏则少得多。1920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南满只派了坂本和上田的两个调查班，同中国军警一起在南满搜索和取缔朝鲜族反日团体，而各地的反日团体则事先闻讯分别避身于各地，有生力量得以保存下来。再者，在南满的许多朝鲜族反日志士，虽然活动于各地，但各地的朝鲜族居住得很分散，尽管这些反日人士以其狭隘的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成立了不少反日团体，但其人数极少、武器装备更是差得可怜，有的团体完全有名无实，所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东满的反日团体既畏惧又重视，而对南满的这些反日团体则并不当回事。结果，分散于南满各地的反日团体也就未曾受到多大的破坏。另一方面，南满是张作霖政权直接管辖的地方，张作霖不同意日本介入，多方加以牵制，日本的军警不敢为所欲为。当然，张作霖政权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勾结，取缔了朝鲜族的反日团体，在当时这不过是他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以镇压朝鲜族反日运动为借口派军队闯入辽宁的权宜之计，他对朝鲜族反日团体的取缔也是不那么积极和强硬。当时，中国各地的官府对日本势力入侵东北十分不满，对朝鲜族的反日运动则寄以一定程度的同情。所以，南满的反日团体利用这种矛盾保存了自己。等到日军的搜查一结束，他们又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一些新的反日组织。当时，北满地区并未遭受日军的讨伐，中日反动势力也比东满和南满薄弱得多，加上北满的朝鲜族群众很少，而且住址很分散，只有中东铁路东部沿线有一些朝鲜族聚居的村屯。再说，北满与俄领的交通虽然便利，但与朝鲜却相距甚远，而且必须取道

东满或南满才能进入朝鲜，所以，北满的反日团体一直很少而又薄弱，尽管在1920年底以后，有一些反日团体从东满一带撤至这里，但他们的大部分不久便转移到了俄领，直到后来，才有一些残余部队留在这里。由于这种原因，北满虽然有了新民府。但新民府的力量比南满的反日力量弱得多，活动的情况也无法与南满相比。至于东满，自1921年以时，民族主义者的势力已微乎其微，而许多青年人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下，信奉共产主义与工农革命思想，以之发动群众开展反日运动。这样，尽管朝鲜族民族主义者开展的反日民族运动在东满走了下坡路，但东满却成了整个东北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第二，各地的反日团体认识到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长期性，逐渐从执行武装斗争路线转为边走自治制路线边努力建立巩固的反日基地。南满的统议府，正义府和北满的新民府，从成立之日起就在中央行政部设立了实业，学务、民事和自治等机构，其武装部队也主要是保卫地方行政机构和保卫自己团体的势力范围，以警卫为主要任务。所以，当时的人们说这个时期的“独立军从长枪队变成了短枪队”。参议府起初把基地设在鸭绿江北岸，主要搞武装斗争，常去朝鲜执行任务，后来，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使全力搞起了反日基地建设。

第三，1920年的三府联合虽然多少克服了以前的群龙无首局面，却并未加强整个反日民族力量。当时联合在一起的，是以往那些反日团体的残余成员。尽管他们努力发动民众想扩大和加强反日力量，却再也无法扩大到以前的规模，而内部矛盾则更加深化。

## (二)

1925年以后，在东北出现的三府鼎立时期，不仅不是民族主义者所领导的反日民族运动的“全盛时期”恰恰相反，从那以后，

其反日民族运动而逐渐分化与衰退，进入了低潮时期。当然，这并不是否定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者的反日运动。他们当时在反日民族斗争中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组建了反日武装队伍，袭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军警哨所，处决了亲日走狗，捣毁了其机构，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以一定的打击。尽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绞尽脑汁，极力隐瞒这方面的统计资料，却还是提供了这一时期反日团体对平安北道、咸镜南道和咸镜北道出击的次数。其具体数字如下：⑧

(统计表一)

| 年<br>度 | 平安北道     |          |            | 咸镜南道     |          |            | 咸镜北道     |          |            |
|--------|----------|----------|------------|----------|----------|------------|----------|----------|------------|
|        | 出击<br>次数 | 出击<br>人次 | 袭击日<br>警次数 | 出击<br>次数 | 出击<br>人次 | 袭击日<br>警次数 | 出击<br>次数 | 出击<br>人次 | 袭击日<br>警次数 |
| 1920   | 908      | 2601     | 23         | 127      | 344      | 4          | 616      | 1498     | 1          |
| 1921   | 454      | 2173     | 8          | 132      | 933      | 4          | 16       | 42       |            |
| 1922   | 250      | 1619     | 9          | 35       | 343      | 3          | 12       | 165      | 2          |
| 1923   | 435      | 2133     | 25         | 19       | 64       |            |          |          | 1          |
| 1924   | 523      | 3349     | 10         | 25       | 94       |            | 7        | 40       | 1          |
| 1925   | 242      | 1369     | 8          | 25       | 117      |            | 3        | 45       |            |
| 1926   | 65       | 280      |            | 1        | 2        |            | 3        | 19       |            |
| 1927   | 10       | 79       | 1          | 4        | 32       |            | 2        | 8        |            |
| 1928   | 4        | 12       |            |          |          |            | 3        | 10       |            |
| 合 计    | 2996     | 14215    | 84         | 368      | 1929     | 11         | 662      | 1827     | 5          |

1923年——1928年在间岛的斗争情况

(统计表二)

| 年度   | 出没次数 | 出没累计人次 | 军费征集额(单位: 元) |
|------|------|--------|--------------|
| 1923 | 217  | 1344   | 4879.00      |
| 1924 | 318  | 1225   | 18464.00     |
| 1925 | 88   | 320    | 6540.00      |
| 1926 | 95   | 522    | 3787.00      |
| 1927 | 117  | 677    |              |
| 1928 | 80   | 309    |              |
| 合计   | 913  | 4397   | 29883.00元    |

根据上述统计,可以得知,从1920年到1928年,反日武装部队共出没于朝鲜北部的三个道4026次,累计出击的总人次为17971人次,袭击日警达100人。从1923年到1928年,他们出没于延边(间岛)共913次,累计人数达4397名,筹集了军饷29 883元。出击朝鲜的次数以在鸭绿江南岸的平安北道最多。据了解。当年,参议府反日武装部队出击的次数占南满各团体总出击数的三分之二。出击图们江南岸咸镜北道的次数虽比出击平安北道的次数少,不过,如果加上出击延边的次数,也达到1572次之多。上述情况可以表明:第1,这一时期的出击、在1925年底以前很频繁,后来便逐渐减少。第2,出击的目的,主要是侦察朝鲜国内情况和募集军饷,袭击日警岗哨则是次要的。第3,募集军饷,在鸭绿江沿岸以朝鲜国内为对象,在图们江沿岸则主要在延边地区进行。这种活动,各反日团体当年主要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开展的,他们此后不远千里去延边和朝鲜国内活动,意在同时宣传民族独立思想。

第二,殚精竭虑建立反日基地。20年代后半期,各反日团体之所以很少派部队出击朝鲜,正是因为他们潜心在东北地区实行

“自治制”。当时，参议府以辑安县为中心，以临江，长白、桓仁等县的南部和通化县西部为其势力范围，成立了5个行政单位。正义府的基地起初设在宽甸、桓仁和桦甸，后来转至磐石、永吉和额穆，最后转到兴京、柳河和通化。据说曾在吉林和黑龙江等省设置了17个地方总管所，共管辖17000户，87000多人。新民府则以宁安和海林为中心，在中东铁路东部沿线和额穆一带设置了15个地方总办事部、拥有文化、实业、财务、教育和外交等行政机构，致力于搞“朝鲜人自治”。

第三，在各地开办军官训练所和反日学校，积极培养反日人才，对青少年进行反日民族教育，努力提高民众的反日民族独立意识。新民府办了城东军官学校，正义府办了桦成义塾，参议府办了辑安军官训练所。正义府还兴办了三星、东明和化兴等中学和南满学院。新民府兴办了新昌、东明和远东等学校。据1926年统计，三府管辖区有34所学校，其中，正义府兴办了22所，新民府兴办了10所，参议府兴办了2所。1927年8月1日，新民府在海林召开北满韩人教育会议，计划在其15个管区内做到有30户以上的村屯便有一所学校，并征收了教育费。但是，这个计划后来未能实现。而上述这些事实却也足以说明三府当时是相当重视反日教育的。

第四，努力振兴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也想改善民众的生活。正义府向中国人租了大量荒地，办起了新安村农场和额穆农场（在蛟河县南岗子一带），让农民在一起共同耕作。1926年11月，正义府设立了农业互助社和兴业实社，负责办农场和碾米所。新民府也于这年11月成立民生会，决定租一些荒地给农民共同耕作，并计划设立殖产组合，奖励搞农副业，还办起消费合作社，实行农业产品统销。但是，这样的决定未能付诸实施，只搞了粮食统销，防止商人进行中间盘剥。

第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朝鲜族的领事裁判权，反对“朝鲜居留民会”，劝告朝鲜族归化中国，加入中国国籍，让朝鲜族人民摆脱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统治。192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搞“满蒙积极政策”，妄图在临江设领事馆而未能得逞。翌年，张作霖被日寇炸死在皇姑屯火车站，东北军阀政府鉴于这些事件，又受到东北人民反日运动的触动，竟认为朝鲜族是“日寇侵略满洲的先锋”，是“中日外交纠纷的祸根”，而对朝鲜族实行迫害与驱逐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在南满的民族主义团体召开了反迫害反驱逐对策研究会，派出代表去辽宁省政府和南京政府请愿，要求保护朝鲜族的合法的社会权益。<sup>⑦</sup>

如上所述，东北民族主义者组成的三府确实曾经努力开展过反日民族运动。但是，由于他们自身具有阶级局限性，工作上又存在严重缺陷，他们组织的反日民族运动不久便逐渐分化和衰退。其原因，概言之，有如下几点。

第一，对朝鲜反日民族运动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缺乏明确而又正确的纲领和机动灵活的策略。它们只是提出了笼统的“民族独立”和单纯的“武装斗争”的口号，以人数不多的武装队伍，处决了一些亲日走狗，筹集了一些军饷。这些武装队伍，主要被用于保卫自身的团体和势力范围，有时搞点袭击日寇的军警岗哨的斗争。这种单纯的军事观点，是不适应当时的时代潮流的。众所周知，20年代的形势是，世界各国实行政党政治，走的是以党治国的道路。在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的是狡猾阴险的满蒙侵略政策，东北各族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存在尖锐而又复杂的矛盾，而东北的封建军阀则既与日寇有矛盾又与之沆瀣一气，镇压朝鲜反日力量，歧视和排斥朝鲜族人民。面对这种情况，三府在东北应当团结没有任何权利而又十分贫穷的朝鲜族民众建立反日基地，开展持久

的反日运动，应当认清同国内的反日运动的水乳交融的关系和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政治形势，不仅要有总的政治纲领，还要准确地掌握各个时期的政治动向，充分发动与组织中国朝鲜族人民，紧紧地依靠他们；同时，很好地团结和争取东北的各族人民，争取同情反日的东北地方政府的支持，使之保持中立，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反日力量，最大限度地壮大与增强自己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当时所需要的是这样明确的战略方针，正如有人说：‘没有理念的革命，没有意识形态的独立战争，只能招致无情的反动。’此语不失为对当时的民族独立运动者的切实的忠告。<sup>⑧</sup>当然，有些人士痛感于此，也组建过高丽革命党和高丽国民党等政党，也曾想提高民众的生活。从1927年起，他们参加过组建民族唯一党的运动，想成立一个包括左翼与右翼人士在内的全民性的单一政党。但是，这个理想未能实现。而许许多多的反日团体的领导者却跟不上时代潮流，固执落后而又狭隘的观念不变，信奉的是单纯的唯军事主义。当然在反日民族运动中，武装斗争可以说是最高的斗争形式，但是，那也必须积聚力量，看准时机权衡条件而举事。

处决亲日分子，募集军饷和袭击日军军警岗哨等等，在当时整个反日民族运动的具体情况下，都不过是建立和保护反日基地的辅助手段。从1925年到1928年，反日团体的武装部队的出击次数之所以显著减少，虽然有三府的路线转为“自治主义”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却是因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日寇与东北军阀勾结，到处取缔反日团体，各地的反日团体已经难以在南满和东满随意活动，白天只能潜伏着，晚上也只能派几个人，换上便衣，带几支手枪进行活动。所以，有的人把这个时期的武装部队称为“夜行人”。这些事实证明，以单纯的恐怖手段作斗争，是落后于

时代的一种错误路线，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起不了更大的作用。也就是说，20年代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与青山里战役时期已经很不相同，与“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抗日武装斗争时期更不能相提并论。而是建设巩固的反日基地、积蓄力量，迎接即将到来的大事变的准备时期。但是，当时三府的多数干部却对此认识不足，依然抱着过去的陈旧观点不放。比如，在北满这样的地区、虽然朝鲜族群众很少，居位得又很分散，而且都很贫穷，但是，中日反动势力在这里的统治力量却比东满和南满薄弱，反日力量有充分的回旋余地。而新民府的领导者们却缺乏明确的斗争策略。以金佐镇为首的新民府军政派，不问政治见识如何，只重用会打枪敢冒险的人，只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竟只偏重于处决一些亲日走狗。1927年2月，新民府中央执行委员长金赫等主要干部被捕后，军政派主张更加有力地开展武装斗争，民政派则主张改善群众生活。两派开始公开对立和分裂。在正义府里也是如此。金东三和金元植等改革派重视农民问题，主张统一，与守旧派也产生了意见分歧。结果，三府都逐渐脱离朝鲜族民众，内讧纷起，给反日运动阵营的团结和壮大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第二，朝鲜族民众迫切要求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和重新分配土地等。三府不仅未能满足这一要求，反而压抑和剥削民众甚至与民众对立，因而失去了群众基础。三府的上层人士，大多数出身于两班地主阶级。由于阶级出身的局限，他们不是依靠民众，为群众解决迫切的和根本的问题，把群众团结在三府的周围，而是凌驾于民众之上，以民众为征收军饷和补充兵力的对象，压抑和剥削民众，加重民众的负担，与民众竟然对立起来。当时，东北朝鲜族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很悲惨的，他们不但在政治上毫无权利和可言，在经济上又受着多重剥削。1930年，

延边的朝鲜族农户37%是佃农。<sup>⑤</sup> 丹东地区的朝鲜族农户则佃农占33%。奉天和北满地区的朝鲜族农户，则几乎全部是佃农。<sup>⑥</sup> 即使一些农户拥有一些土地，朝鲜族农民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在吉林省(除去延边地区，但包括黑龙江省松花江以南的地区)只有5785町步(1町步等于14.736市亩)，在黑龙江省只有362町步。<sup>⑦</sup> 至于租种土地耕作的期限，在居住于滨绥(哈尔滨到绥芬河)铁路沿线的316个农户中，有177户为1年，9户为2年，3年，7户为4年，另有5户的情况不详。<sup>⑧</sup> 在佃租方面，满铁沿线和南满地区要交收成的40%到50%，东边道地区大部分要交收成的60%。<sup>⑨</sup> 大部分朝鲜农民从朝鲜半岛来到东北地区定居之初是赤手空拳的贫民，所到之处租种地主土地时，一切农具资金乃至生活费都靠地主提供，过的是半农奴的生活。他们还得靠借高利贷勉强糊口。秋收之后，交完佃租，还清高利贷，一年胼手胝足竟几乎一无所获。大部分朝鲜族农民当时很难过上稳定的生活。<sup>⑩</sup> 除此之外，还要向政府缴纳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附加税，这部分的支出，为其生活水平难以承受。由于他们是朝鲜族，还要缴纳朝鲜人民居住税、迁入迁出税、被佃税、水利税和朝鲜人土地租用证明资等等。这些苛捐杂税，没有固定的数额，由地方政府随心所欲规定，任意残酷剥削朝鲜族农民。有些捐税，本应由地主负担，地主却转嫁给朝鲜族农民。比如，在辽宁省宽甸县，连荒地开垦税、种子费、耕作费和水利税等，也均由佃农负担。<sup>⑪</sup> 高利贷盘剥更是地地道道的“吸血鬼”，负债人无法躲过这种重利的盘剥。北满的滨绥地区201户朝鲜族农民中，只有3户没借债，其余198户都负债累累。其中75.6%的负债户是信用债务者，没有任何物件可作担保。<sup>⑫</sup> 所以，当时朝鲜族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中国农民，甚至比朝鲜国内的农民还低。他们大部分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度日如年。由此可见，当时85%